

从西潮到东风

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
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

林毅夫◎著

余江◎译

COMING
INTO
FOCUS

What really caused the Great Recession?
How best to recover?
How to avoid another?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What really caused the Great Recession?
How best to recover?
How to avoid another?

从西潮到东风

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
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

林毅夫◎著

余江◎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西潮到东风/林毅夫著,余江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86-3517-0

I. 从… II. ①林… ②余… III.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研究 IV.F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03636 号

从西潮到东风

著 者: 林毅夫

译 者: 余 江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517-0/F·2714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对世界来说，发展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对中国来说，我们一直在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从西潮到东风，从来没有显得如此迫切……
这是一本涉及世界经济发展的书，
也是一本足以引爆中国发展大讨论的书。

全球化的视角，新的分析框架

在阅读林毅夫教授的新著《从西潮到东风》时，我想起2007年年末，林毅夫教授成为首位应邀主讲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中国学者。马歇尔曾经说：“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毫不例外地坚持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从林毅夫教授的《从西潮到东风》等一系列新作中，我们看到了马歇尔所说的近代经济学创始者的种种特质。我曾经在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从多角度了解了林毅夫教授。林毅夫教授在即将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曾经到香港主办一系列讲座，阐述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思考以及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看法，我当时正好在香港工作，有幸聆听讲座，也为林毅夫教授获得这样一个施展才华、拓展视野的新平台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我主持翻译的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之际，出版社联系当时正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他很快就在百忙之中及时给予回复并撰写了封底推荐语。

2012年6月，林毅夫教授结束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回到北京大学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我也关注到林毅夫教授回国后开始出版了一系列的新著作，其中就包括这本《从西潮到东风》。在这些新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拥有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经验积累的林毅夫教授在研究成果中开始体现出鲜明的新特点，以我个人的总结，就是新的分析框架以及更广阔的全球化视角。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彼时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总量仅占全球的7.4%，而到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已经接近全球15%，这10年间中国迅速发展为全球工业生产中心，也几乎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使得中国在这一轮危机中所遇到的挑战和未来道路的探索都比以前更复杂，这既是对现有的经济分析框架的挑战，同时也给优秀的经济学者以创新的动力。

在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历程中，从早期强调进口替代战略的所谓“发展经济学1.0版本”，到对治理和商业环境改革的所谓“发展经济学2.0版本”，再到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改进服务供给的“发展经济学2.5版本”，都在经济发展史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林毅夫教授从全球化的比较角度发现，过去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理论模式前进。在他看来，现在是时候立足于亚当·斯密的观点，回归到经济增长的本质，关注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以及基于潜在比较优势所能做好的产业。当前中国所面对的现实是，此前所依赖的人口优势、环境资源优势、低收入制度优势等都已经逐步减弱甚至难以为继，如何寻找新的比较优势，通过制度和治理改革形成新的禀赋，可能是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竞争优势的核心，甚至也是新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寻求共赢之道的核心。

我想，这些问题也必然是以经济发展理论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经常思考的问题，《从西潮到东风》这本书可以说就是林毅夫教授将他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的思考所得与读者分享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让我们得以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待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演化路程，也得以用更为协调、共赢的思维寻求解决之道。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这一轮经济危机逐渐平息，而新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雏形得以显现时，我们还能清晰地记起林毅夫教授在此时展现给我们的探索和预测。

人们常说经济学是经世济用之学，经济发展理论更是如此。作为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一要职的发展中国家学者，林毅夫教授具有他个人鲜明的研究特点和优势。林毅夫教授先后在台湾大学、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有过长时间的求学经历，此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进行经济学研究，并于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这些长期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领域内从事研究和工作的经历，使得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不失理论深度又更关注经济现实，专注前沿又注重反思。这在他从早年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到新近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框架》、《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等专著中都已经有所展现。

在阅读这些著作时，读者可以发现，在林毅夫教授看来，这种反思的目的应当是寻求一条全球经济共赢的改革道路。四年前林毅夫教授就职世界银行时，正值金融危机发生之时，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此前这轮“不寻常的投资拉动的长期繁荣”所掩盖的经济体系的固有缺陷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对症之策，特别是各经济体之间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反而带来更多摩擦和矛盾。事实上，即便在林毅夫教授任满回国的现在，这场危机的后遗症仍然挥之不去，关于这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

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研究争论和实践摩擦还在继续。

因此在这个时候，林毅夫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当前全球经济、中国经济以及经济学方法论方面都有宝贵的启示和收获。在本书中，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理论性反思。对这一轮金融和经济危机有诸多理论性解释，较为广泛被接受的是危机发端于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状况的急剧恶化，其背后是东亚各经济体在 1998 年危机后所采取的作为自保的出口导向策略和外汇储备积累。这无疑过多将失衡的天平压在发展中国家一端，林毅夫教授对此的看法是，危机根源于美国金融监管放松带来的高杠杆率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由此引发 21 世纪前十年的流动性剧增和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过度消费、财政赤字、美元国际储备地位等机制形成大量资本外流，最终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扩散为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一推断揭示，这种美元储备地位的重要性与其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制衡缺失，推动了近十年来的全球繁荣，也同样埋下危机的种子。过多地将全球失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是有失偏颇的，中国在 2005 年以后才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并且这种巨额经常账户盈余也并非完全源自家庭储蓄动机，而更多是双轨制改革后遗症下劳动力大量富余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持续市场扭曲。因此，当前的经济失衡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都能找到病源，单方面解决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其次，是对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失衡解决的理论思考。在这一次金融动荡之后，对凯恩斯主义的探讨和批判十分激烈。2009 年以后全球性的逆周期宽松货币政策、主动财政扩张暂时拉动了全球经济复苏，但 4 年之后人们发现由此造成的杠杆率提升、低利率依赖、量化宽松模式效果递减、贸易保护再次兴起等负面压力更为显著。人们开始认识到，凯恩斯主义在单一国家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提升外部需求走出危机，但如果危机在发达

国家同时发生，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就显得缺乏实际效果。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种“超越凯恩斯主义”模式，即进行全球协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他指出：一方面，全球性财政政策应该具有主动性和反周期的特点，重点放在能促进当前就业和提高未来生产率的项目上，特别是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教育等项目；另一方面，仍有巨大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促进生产率推进基础设施投资，而国内机会有限的发达国家则应该创造条件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而实现共赢。可以看到，新的“马歇尔计划”并非不可行，关键是要跳出一国一城的局限，应当推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持续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样也能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提高发达国家的需求。通过给多边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提供同等资金，能够起到连接不同经济体实际需求的作用，从短期和长期来看，林毅夫教授站在他的立场上给出一个共赢的策略。

最后，是对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探索。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显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而新兴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同样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因为这并不能保证所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都能保持健康、强劲的经济，从而导致各种货币就外汇储备和国际贸易地位展开更激烈的竞争。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林毅夫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单一超国家储备货币，即用名为“纸黄金”的全球储备货币来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体系。作为凯恩斯曾经提出名为“班柯”的国际货币的改进版，这种方案在当前美国经济规模占比下降、美元储备货币不稳定性日益显现的背景下，可能是一种多方能够受益的模式。尽管可以预见的是，在操作上这种方案还需要经历较长期的博弈、探索和尝试，但正如 70 多年前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过程中对罗斯福总统的答词里所说的：“既然我们要致力于一种共同标准、共同法则，它就应该是所有人乐于接受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

系改革方向无疑也应当向更稳健、照顾更多经济体利益以及避免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内在冲突的道路前进。

凯恩斯曾经调侃说，实际上经济学并不是十分困难的学科，但是为什么优秀的经济学家风毛麟角呢？他认为关键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多种学科以及从理论到实践的“种种才能的良好结合”。读者可以从林毅夫教授近期的一系列新著作，当然也包括《从西潮到东方》这本书中，看到这种结合所取得的成果。

巴曙松 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2012年8月27日

世界银行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之一，其首席经济学家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界的最高职位，历来都由人们仰之弥高的欧美发达国家著名经济学家担任。我有幸成为第一位担任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任期从2008年6月开始。接受此任命时，我原打算根据世界银行的成立宗旨以及我的职位要求，将我20多年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发展成功以及失败经验的心得奉献于世界的减贫事业，然而意想不到的，刚上任3个月，就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在分工上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业务范围。这场危机突如其来，由发达国家引爆，迅即波及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减贫事业增添了诸多困难。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这场危机，避免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再次发生同样的危机，我必须对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思考其经验教训，并对最终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提出一些建议。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这些努力的一个成果，书中所展现的视角可能会对人们通

常接受的观点形成挑战。

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那样，我过去总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部真经，只需学会，带回国来应用，就可以帮助祖国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初，我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机会，负笈现代经济学的圣地——芝加哥大学，向包括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大师们学习现代经济学。

四年寒窗苦读，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又到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谢绝了几所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工作邀请，我满怀信心回到改革开放事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祖国，准备奉献所学到的前沿知识，出谋划策，帮助政府解决改革发展遇到的问题。但牛刀初试以后，却让我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逻辑严谨、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运用产生了疑惑。

1988年，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首次遭遇到了两位数水平的通货膨胀。一般经济学教科书和前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都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治理通胀。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调整利率，而是进行所谓的治理整顿，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大量的在建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以当时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准绳来评价，这样的治理政策是不理性的。

自亚当·斯密以降，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理性人假设。经济学教科书中所介绍的和前沿学刊上所发表的理论均以决策者的行为、选择都合乎理性原则为隐含前提，也就是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总会从各种可选方案中选出其认为最好的、最能实现他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方案。如果中国的通胀治理政策表明中国政府是非理性的，那么现代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中国就不适用。但如果中国政府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它的政策又

怎么能在 1979 年启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连续 10 年、年均 10% 的高速增长？很显然中国政府是理性的，面对 1988 年的高通胀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不同于教科书和前沿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约束不同于当时教科书和前沿理论中所假设的条件。

那次经验让我体悟到，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能简单照搬教科书和学刊中的现成理论，必须深入中国经济的现实，根据中国实际的条件约束，按照理性原则自己进行分析，自己建立理论模型，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方案。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也曾有类似的经验。在他开始进行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时，人们普遍认为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不会像现代工业社会的“理性”农民那样进行储蓄和投资，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忙下来以后，除了留些种子外，他们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但舒尔茨教授经过对落后国家农民的仔细观察和研究后发现，这些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不进行储蓄和投资其实是理性的，因为在缺乏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储蓄和投资的边际报酬接近于 0，对生活于生存线边沿的传统社会的农民来说，省吃俭用，进行投资不能多产多得，反而使自己进一步缺衣少食，是不理性的行为。在舒尔茨发表于 1964 年的经典名著《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他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社会的关键不在于改造农民，而在于源源不断地给落后国家的农民提供合适的、较好的、能使他们增产增收的新技术。他的这一洞见给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和农业政策带来了革命性影响。

对于一位像我这样以研究理论和政策问题为职志的年轻经济学者来说，既然中国政府是理性的，那么为何对 1988 年的通货膨胀不愿意采取一般理论所主张的提高利率的政策来治理？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又让我联想到为何中国已经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还要继续给不少企业

各种保护和补贴？往上追溯，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要采用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种市场扭曲？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考察和思索，让我豁然发现，这是因为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生存依赖于低利率贷款和其他人为扭曲所提供的隐性补贴。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数是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推行“10 年超英、15 年赶美”的赶超战略下的产物，具有资本密集的特点，技术比较先进。但是在 50 年代即使到 80 年代，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这些企业所在的产业不符合中国劳动力多、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情，它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如果 1988 年中国政府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胀，或者 1979 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根据“华盛顿共识”采取休克疗法立即消除各种保护、扭曲，将会导致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造成像后来出现于东欧和苏联转型时那样的大规模失业以及社会和政治动荡。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利于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发展。

当时国内外经济学术界有不少人根据那时的理论认识，持“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双轨经济是最糟的经济”的观点。但是，中国政府却推行双轨制的转型策略，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重工业部门的低效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而同时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此点认识，蔡昉、李周和我在 1994 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进行了论述，后来我在 2008 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中也再次进行了阐述。^①

① 《中国的奇迹》英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 1996 年出版，后来还被译成日、韩、法、俄、越等国文字出版。《中国经济专题》德文版于 2010 年出版，英文版则以《解读中国经济》(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为名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2012 年出版，日文、韩文、越南文和俄文等文字版本也即将面世。

对于中国政府治理 1988 年通货膨胀政策的思考，启发了我采取一种老子所主张的“如婴儿之未孩”的“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在考察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时，我不再直接根据现成的理论或者过去的经验，而是每次都尝试直接寻找经济现象背后的行为人，分析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面临的约束及可能的选择，每次都自己从头开始构造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因果关系模型，就像我新近出版的《本体与常无：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对话》一书中所倡导的那样。^①

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式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跟着水涨船高，获选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我的职责包括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首席经济顾问，领导世界银行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健康、快速、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使全世界摆脱贫困。尽管在 21 世纪的最初十年，全球经济涌现出了包括若干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多个增长极，但是非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依然在低收入陷阱中挣扎，未能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本轮危机未爆发前，我认为自己在世界银行的工作上面对的主要挑战在于能否提出一个可行、有效、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框架，帮助那些贫困国家改善发展绩效。

任职后的第一周，我就访问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致力于促进贫困国家发展经济的原有计划很快就被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所打乱。宏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理论和诸多大师级的宏观经济学家既未能预见这

^① 此书根据我在北京大学上课时和学生的对话整理而成，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05 年以“论经济学方法：与林老师对话”为题出版，英文版则以“本体与常无：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对话”（*Benti and Changwu: Dialogues on Methodology in Economics*）为名由圣智学习出版公司于 2012 年出版。

场危机的到来，危机到来以后也未能对危机的程度和持久度做出准确的判断，提出解决问题帮助世界摆脱危机的可行办法。在国内工作时所养成的“常无”心态，对我理解这场危机的本质、来龙去脉和出路大有帮助。

当我在2008年6月抵达华盛顿的时候，粮食和能源价格的飞涨占据了所有媒体的显著位置，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向自己的同事提出：在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后，接下来是否会发生通货紧缩？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相信“大缓和”的经验和说法，其含义是，在本轮危机爆发前20年的经验证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成功地缓和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认为会发生通货紧缩是无稽之谈。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治理通货紧缩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虽然危机来势汹汹，但是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短者3个季度，长者7个季度，危机就会过去，经济就复苏，这次危机也不会例外。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理论，多数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只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给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支持，并依靠在危机中财政收入减少、社会开支增加所形成的财政赤字的“自动稳定机制”的作用就可以度过危机。我则怀疑：由于全球经济在危机前经历了不寻常的投资拉动的长期繁荣，形成了许多生产能力，危机爆发后各国失业率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产能也必然过剩，尤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很难找到新的机会，民间的投资意愿会很低，没有启动需求的外在刺激，经济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怪圈。

过去的危机一般只发生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政府可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货币贬值增加出口，靠外部需求的拉动走出危机。这次危机则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问题从量变引起质变，各个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产

能过剩的问题不能靠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解决，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思路和对策，这场危机将会旷日持久，难以摆脱。

危机之初，我提议进行全球协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将其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Beyond Keynesianism），以启动全球需求，消化全球过剩产能，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当时多数经济学家对各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持保留态度，认为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增加民间未来税负的预期，减少民间当前的消费意愿，陷入政府债务迅速高筑而总需求增加有限的“李嘉图等价”的困境，对全球协同的反周期政策更是不以为然。

通过 20 国集团采取的协同刺激措施，世界经济在 2010 年上半年出现了复苏的苗头。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0 年秋季年会时提出建议，要求那些受危机困扰的国家紧缩财政、减少赤字，以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我当时指出，这样的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反而激增，给经济复苏蒙上一层新的阴影，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的意愿。这一担心不幸再次被证实。我当时提出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减少短期赤字，而在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质量，使其在短期能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在中长期提高生产率、经济的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实现中长期的财政平衡。这个观点在 2011 年秋季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主要政策方向。

如今，全球都在关注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而我担心的是，如果不采纳我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提议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复苏计划，化危为机，给发生危机的高收入国家提供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世界经济可能走向更为漫长的衰退“新常态”，甚至陷入多个“失去的十年”。我也高兴地看到我这一主张在全球舆论和政策界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本书将阐述我对全球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指出可以引领全球走向稳